

## 韶华婉婉 春风和畅

### ——常振画鸡赏析

岳葆春



望,母鸡俯身护雏,雏鸡依偎在侧,天伦之乐温情跃然纸上;《韶华婉婉》里,公鸡目光炯炯,母鸡低头觅食,两只雏鸡憨态可掬,在青草间嬉戏,更添生活意趣。画家没有刻意渲染宏大叙事,而是将目光投向日常的细节之美,以鸡喻人,传递出对家庭和睦、生命繁衍的质朴赞美。

淮南作为淮河文化的重要承载地,历来重视花鸟题材的写意表达,常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,以本土生活为蓝本,将田间常见的鸡群与象征富贵的牡丹结合,让传统吉祥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。他笔下的鸡,不再是庙堂之上的符号,而是带着泥土气息的生命个体,这种“接地气”的表达,既延续了文人画的雅致,又注入了民间艺术的鲜活,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。

这两幅作品,是常振对传统花鸟画的致敬,也是他对生活之美的深情凝视。生活之美,文人之趣,在笔墨流转间,他将吉祥如意、生命温情与地域文化融为一体,让观者在欣赏笔墨之美的同时,感受到春日里的生机与暖意,也读懂了一位本土画家对生活、对传统的赤诚之心。

在淮南画家常振的笔下,雄鸡昂首挺立,与母鸡、雏鸡相依相伴,衬以盛放的牡丹,将传统花鸟画的意趣与生活温情熔于一炉。这两幅兼工带写的作品,既是对“鸡”这一传统吉祥意象的当代诠释,也是画家笔墨功力与人文情怀的生动展现。

常振的笔墨语言,在“工”与“写”之间找到了精妙平衡。画中公鸡的冠羽、母鸡的绒羽,乃至雏鸡蓬松的绒毛,都以细腻工笔层层晕染,红冠的明艳、黑羽的苍劲、褐翅的温润,在细节处尽显生命质感;而牡丹的枝叶、背景的草石,则以写意笔法挥洒而出,墨色浓淡交错,线条灵动洒脱,既保留了物象的形态之真,又赋予画面疏朗通透的气韵。这种“兼工带写”的手法,让工笔的精致与写意的放逸相互映衬,使画面在写实与抒情之间达成和谐。

画面的构图与意象,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蕴。两幅作品均以“鸡”为核心,谐音“吉”,寓意吉祥如意;牡丹则是“富贵”的象征,与鸡组合成“富贵吉祥”的美好祝愿,体现了传统中国画“借物抒情”的诗意之美。《富贵禧来》中,公鸡昂首回



常振  
绘

## 开阔地理解文学



鲁迅弃医从文,是中国现代文学开端一个带有寓言色彩的故事。鲁迅的理由是,要用文学去改造国民的精神,否则再好的医术维护的也不过是愚弱的肉体。实际上,“文学改造国民的精神”这一命题不仅限于现代文学,自古以来的经典文学一直在改造乃至塑造国民的精神。《诗经》《论语》《离骚》《庄子》《世说新语》……可以说,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那批作品,在数千年里锻造了美丽的中国心灵。

文学是什么?它不仅意味着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戏剧,它不仅意味着古代文学、现代文学,一切能唤醒人心的语言文字都是文学。文学也不仅仅表现为作品,它是一种基本能力,一种把自己、他人、世界当作一本书来阅读的能力,一种细腻地与他人共情的能力。文学不意味着束之高阁的经典、佶屈聱牙的研究、吹嘘炫耀的资本,文学是我们的感受,我们的生活,我们的喜怒哀乐在语言中留下的长长的拖痕。

古典文学大家顾随在《退之诗说》里如此评价鲁智深:“虽不作诗亦可成为诗人”“别人是将‘诗’表现在诗里,鲁智深把‘诗’表现在生活里”。诗人华莱士·史蒂文斯的话可以作为这一观察的注解:“对生活所怀抱的诗意胸襟要大于任何一首具体的诗,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开始认识诗的精神。”也就是说,文学不仅仅是形诸文字的作品,它同时也是我们对待生活、对待生命的一种高远超迈的态度。修习文学不仅要得其形,更要得其神。

在《中国文学八讲》里,我不仅讲鲁迅、讲新诗,也讲《诗经》《论语》《庄子》。这些都可以称为“当代文学”,因为它们在当代语境中仍然崭新、美丽,熠熠生辉。《诗经》“明亮赤诚”可抚慰人心,《论语》有宽厚先进的人文之思,《庄子》是化解焦虑的心灵调节术,鲁迅确立了“医治”与“反抗绝望”的行动哲学,新诗乃“精神之磨刀石”,使人凛冽而清醒。经典之为经典,正在于它对普通人和日常的用处。经典是人人可读的,并不能为专家所垄断。

通过这本书,我想带读者一起去开阔地理解文学,激活读者对文学的热爱。我决不承认文学无用,当下人们谈论的“文学无用”,其实只是些顶着“文学”名头的低劣文字无用,而在无数的角落里,强壮的文学仍然在不屈不挠地生长着。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认知文学的观念。我在书中谈到的那些古老和现代的经典,它们还强壮有力地活着,阅读它们,让人类靠近向上的道路。看看大众阅读和大众文创领域,持续不断的“陶渊明确热”“李白热”“杜甫热”“苏轼热”“《红楼梦》热”等等,即是明证。

文学是有用的。从大的方面说,文学是改变世道人心的事业;从小的方面说,文学培养读者的同情能力、共情能力、自省能力,帮助建设个体的精神世界。以上两点,是《中国文学八讲》一书隐藏的两种底层逻辑。用这些基本指标去创造文学、测量文学、筛选文学,有助于文艺的再一次繁盛。

来源:人民日报